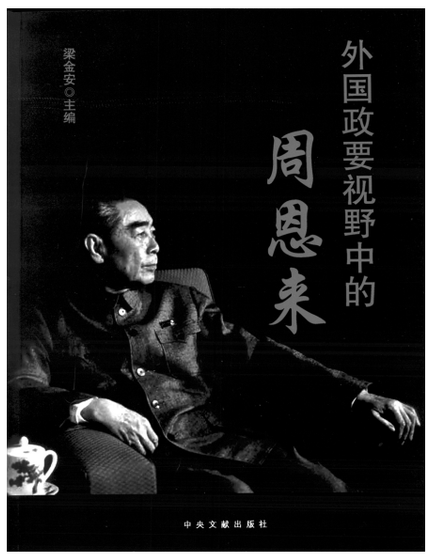
▼三味斋

换个视角看伟人

□柳 萌



学者梁金安主编的《外国政要视野中的周恩来》，是一本很有阅读和收藏价值的好书。这本书换了一个新的视角，看我们久已熟悉的中国伟人，而这个角度又非常冷静、客观，并且具有世界视野的对比性，因此，就更让人认可和信服。这对于我们重观20世纪外交风云很有帮助。

周恩来总理是我国杰出的国家领导人。他去世时十里长街送别的情景，至今想起依然历历在目，那肃穆、庄严、悲痛和崇敬的场面，犹如一幅优秀的画作，珍藏在我们每个人心室。这足已说明这位开国总理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但是，外国人——特别是外国政界要人，如何看待和评价周恩来，作为普通百姓却很少知道，这本《外国政要视野中的周恩来》，恰好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让我们从国际友人的议论中，了解周恩来对世界的贡献。

作为大国的重要外交家周恩来，是一位不可忽视的伟大人物，在外交风云多变的20世纪，他和他的各国同行一起，解决了许多重大世界问题。他们制定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至今仍是最好的安定世界的规则。新中国和多国建立外交关系、中日关系和中美关系正常化、新中国进入联合国、中苏两国对峙妥善解决，如此等等，都是在他任上完成的，那时的中国很有点扬眉吐气的气势。所以基辛格说：“他致力于本国利益，深刻理解世界局势，是既敏锐机智又有个人魅力的政治家。”尼克松说：“没有一个人在敏锐的才智、哲理的通达和阅历带来的智慧方面超过他。”这些评价和赞誉都是很到位的。

“弱国无外交”，周恩来担任外交部长的年代，当时的中国经济并不算富有，军事力量也谈不上怎样强大，而外交上却很活跃很有力量。这同政治家出身的周恩来的外交谋略和务实运作不无关系，周恩来和他的后继人陈毅等，当时的外交形象在世界上非常好。现在我们的经济、军事国力，应该说比之过去要强大了许多，外交形象更应该与国力相匹配。我们期待有更多外交家，具有周恩来那样的谋略，以及他那样的外交气势。

读了《外国政要视野中的周恩来》这本书，我觉得外交家的个人魅力非常重要，他们的谈吐举止有时会影响国家声誉，周恩来的个人魅力就是无可挑剔的。他个人魅力中有两点特别让国际友人称道：一是言行一致，基辛格说周恩来“他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说就怎么做”。这正是周恩来生前常挂嘴边的“言必行，行必果”。二是平易近人，日本运动员松崎君代回忆周恩来时说，周总理跟她说“有了孩子，早日告知啊……”他还对其他日本友人说：“上野的森林现在还有吗？”“神田的书店街怎样了？”以这些非外交词令达到外交效果，这是周恩来的外交风格，更是他个人的外交魅力。通常印象中不苟言笑的外交官形象，在周恩来身上几乎见不到，正如法国前外交部长舒曼在跟周恩来接触后所说：“我对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是陌生的，我对于中国了解得不多，对中国的语言一窍不通。然而，（跟周恩来在一起）我感到很随便自在。”

但是，在关乎国家利益问题上，在面对不友好的外交对手时，周恩来却丝毫都不让步，会用同样机智的方法，达到他的原则性表述。美国著名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周恩来逝世后的悼念文章里，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情：有次周恩来参加完一个国际会议，途经莫斯科时“苏联东道主给周以盛大的外交接待。在一个内屋，周坐下来与斯大林死后的政治局委员们——当时以马林科夫为首，包括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米高扬——共进晚餐……当两名西文记者在门口探头往里看时，他们看到周先生逐个向各位客人敬酒。但是，使他们感到惊奇的是，他讲的是英语，这是记者们懂、西文外交官懂，但俄国人都不懂的语言。当周先生来到米高扬面前时，这位亚美尼亚人以阴沉的声调用俄语说：‘周，你为什么不讲俄语？你的俄语很好嘛。’周先生用英语回答说：‘米高扬，现在是你学习讲中国话的时候了。’米高扬说：‘中文是很难学的语言。’周先生高兴地说：‘不要紧，每天上午到我们大使馆来，我们将高兴地教你。”这位资深美国记者和作家，从周恩来这番极富讽刺性的讲话里，敏感地意识到中俄两国的交恶。所以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说：“周先生喜欢谈——他机智，会讽刺，难对付，思想开阔。”

作为具有世界影响的政治人物，世界政要和记者对周恩来总理，都会以自己的认识和感受，真实地表述和描写心中的周恩来。从整体形象的文字来说，最有概括力也最准确的记述，当属埃及萨达特总统，他说：“（周恩来）是当代最优秀的领导，是第一流的国家领导人。当你同周恩来坐在一起的时候，你会感到是同一位亲切、温和的诗人坐在一起。他的声音很低，他的话语是那么亲切和感染人。他是亲切、慈祥和友好的光辉典范。他的能力就集中在他一双眼睛里，那里有别人所未曾有过的迷人的、洞察一切的魅力。而关于他的渊博的学问和超凡的生活，可以随便说到哪一方面。他是以智慧和政治天才领导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的人。”这就是外国政要眼中的周恩来。这也是我们一直怀念他的原因所在。

《外国政要视野中的周恩来》这本书，图文并茂，版面舒展，读起来能引人入胜。由于搜集的资料比较丰富、翔实，对于研究和怀念这位世纪伟人，都是一部值得阅读和珍藏的书。起码在我的阅读范围内，这是第一次集中读到外国政要和著名媒体人对周恩来总理的评价。

（《外国政要视野中的周恩来》，梁金安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3月出版）

▼尚书坊

情比海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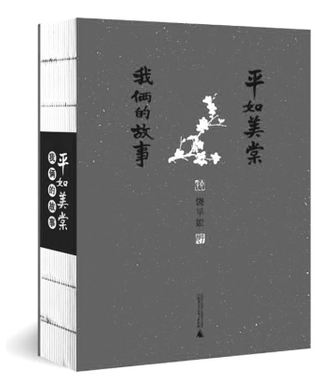
□麻 宁

在阴沉多雨的一天，读完了《平如美棠——我们俩的故事》，心潮起伏。

这是92岁的饶平如献给亡妻的真情礼物，327页的文和图，回顾了他们一生的经历。文从字顺，画谐情深。看画风像丰子恺，读文字竟又有杨绛之风。一翻开就是平如美棠的合影，平如是经典意义上的“大眼睛双眼皮”，眉目疏朗，笑容温和；美棠柳眉细目，容长脸儿，是民国女子最盛行的那种风韵之美。1946年夏天，饶平如按照父亲的安排，到世交的伯父家相亲，“走至第三进厅堂时，忽见左面正房窗门正开着，有个年约二十面容娇好的女子正在揽镜自照，涂抹口红”——这就是他第一次看见美棠的印象。我问平如：“美棠的家人说你生得好，‘眼睛好看’，那你觉得美棠美吗？”他答：“当然美。我那时候觉得她特别好看。美棠一辈子，到老了都是好看体面的。”

书的最末，是美棠写给平如的家书，“你带回来的两只鸡又肥又壮，我们做冷盘”、“准备给你买一件短袖衬衫回来好穿。你欢喜白的还是淡灰的？”……不过是些生活中的碎碎念，几十年的时光，竟那样一晃就过去了。

看这本书，常会想起钱锺书和杨绛，而饶平如说他也喜欢杨绛和钱锺书。“我读杨先生的书的时候就在想，钱杨两先生学问那么大，怎么说出来的话跟我心里面想的一模一样呢！”钱锺书曾这样评价跟杨绛的婚姻：“1.我遇到她之前，从未想过要结婚；2.跟她结婚后，从不后悔娶了她；3.也从未想过娶别的女人。”饶平如也是如此感慨：“这说的正是我对美棠的心意啊！”



《平如美棠》是画册，插画大多是风趣故事，可有一幅是医学教学图——《家庭腹膜透析示意图》。腹腔管、引流管、透析液、恒温箱……这些专业的医疗设备，他一一画来，甚至还用两页的小字，分步详细介绍家庭腹膜透析的工序。不是用得极熟练的人，断画不出这样清晰准确的图，写不出这样详尽完备的字。因他为美棠做了整整4年的家庭透析，每次需要一个半小时。问饶平如每周要做几次，他纠正：不是每周，是每天要做4次的呀。这数字着实太惊人。平如却像个孩子一样语带热望：“我听医生讲过，有人做这个腹透最多能多活20年。我听了非常高兴，我就跟美棠说啊，我就做20年好啦，我不觉得累啊，我心里很开心，巴不得给你做20年才好。”

饶平如和美棠都是天性恬淡的人，多少风起云涌世事变迁在笔下轻轻一带就过去了。比如写到1968年家里经济困难，美棠不得已将家中东西一一变卖，连最后一只母亲陪嫁的金镯子也留不下。“为人父母永远想着要给儿女留下点什么，却终是什么也留不下来。她只能把手镯套在小红（女儿）手腕上，让她戴着镯子睡了一晚。待到天亮再取下镯子拿去卖了。”读来何等心酸的经历，可在饶平如这儿，这段故事便是到此为止了。饶平如认为，母亲对女儿的深情，是怎么写也写不出的，可是做过母亲和做过女儿的人，一定能领会到。

美棠去世后，平如拿起画笔，一点一滴地把他们的故事画下来，居然有18册之多。这便是这本书的原型——最初，他没想到要出版（后来他们的故事在网络上流传，并上了柴静的《看见》栏目），只是想留住这一段事关美棠的回忆，因为“海并不深，怀念一个人，比海还要深”。

（《平如美棠——我们俩的故事》，饶平如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出版）

▼短 评

以他国为镜，可知荣辱

□姜 涛

有这么一个国家，让我们对它又爱又恨；有这么一个国家，在我们大力吐槽的同时又不得不大为叹服；有这么一个国家，总是让我们对它充满了好奇——为什么以瘦为美的日本社会崇尚肥胖丰盈的相扑运动？招财猫传说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历史真相？日本男子成年祭的鲤鱼旗有什么寓意？味噌汤究竟有多么美味？诡异叵测的日本忍术是虚幻传奇还是真实存在？

在《日本调——一部穿越时空的日本风情史》一书中，作者樱雪丸以其独特的视角，融合留学日本多年体验和对日本历史的研究，以风趣幽默的风格、调侃辛辣的笔触，深入剖析日本人的衣食住行以及政治、文化、宗教、习俗等各个方面的趣闻逸事，还原一个鲜活、独特的扶桑国原貌，展示了一段华丽、绚烂的东洋岛小调。

无论日本和中国在历史上文化交流多么频繁，日本文化的发展还是有它的许多特点，有许多既不同于中国又不同于西方的发展规律。在不断汲取他国文化的同时，日本不曾忽视本土文化的发展，两者不断磨合和交融，最终形成了今天丰富多彩、深远厚重的民族文化和让人叹为观止的独特风俗民情。在日本文化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有许多看起来是矛盾对立的现象，可是又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自具一格的东亚文化，这种情况可以说是举世罕见的。

（《日本调——一部穿越时空的日本风情史》，樱雪丸著，武汉出版社2013年6月出版）

▼书 评

时代心灵的发声

□凤凰文化

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什么是“文化”，似乎什么都可以算作“文化”，但在学科分工越来越细化的如今，什么也都不再被笼统地称为“文化”。做文化，若不愿“喧宾夺主”地抢占“旗帜鲜明”的诸侯之邦，便只能在夹缝里捡拾剩余。也没有人能够不屑于“文化”这块冠冕堂皇的招牌，似乎只要抱住它就能瞬时拥有气质和档次。然而当娱乐明星都走上“公知路线”时，便也不会再有谁因被文化的镜头瞄准而感到超凡脱俗的荣耀。深刻而不深沉容易被批评为艰涩，深沉而不深邃容易被嘲笑为做作，锋利而不世故会在权力面前招来危险，世故而不锋利又会在大众那里落得油滑无风骨之讥。只剩下风轻云淡、月圆花好的小清新格调，依然不能免于和已经沦为骂人话的“文艺”画上等号。

然而，文化总还是要做，也总得有人来做，我等虽不羞于直面为稻粱谋的现实，也还至少残存着骨子里那一点醒世纳言的书生意气。既然时代嘈杂、文化泛滥，倒不如就着这噪杂发声，借着那泛滥开拓，姑且美其名曰“我们年代的心灵史”吧。同时，发声与言说本身即是一种姿态：不甘沉默，有可奉告。

两册《有可奉告》是拓荒之作，结集了凤凰网以往各档节目的精华，书中文字以访谈实录为主，稍加整理，虽不以对话体形式出现，亦未强改成书面语，为的是原汁原味地保留效果，也避免擅自润饰弄巧成拙地毁了嘉宾们各有风格的成熟特色。倘若不曾观看过节目，不妨忙中抽闲读一读这些文字。这也正是我们结集成册的目的之一：疲于奔命的今天，专注已成奢侈，捧卷在手零敲碎打不失为一种安静的消遣，“人困路崎蹙驴嘶”固然不再，堵塞的通勤途中还是需要找点东西来平复恼人的心绪并且弥补上白白流走的大好光阴。

（《有可奉告》，胡涛主编，新星出版社2013年7月出版）

面对灵魂的密谈

——评王宏波的《党校日记》

□金恒宝

日记是面对自己灵魂的密谈。

《党校日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是日记体散文，在这部新颖别致的书中，我不光读出了王宏波对党校的一往情深、对党的坚定信仰，而且读出了他深湛的学识、广博的知识以及对生活的热爱。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荣利彬在《党校日记》序言中说：“宏波同志在每一天的日记中都详细地记叙了他在学习中的所思所感所悟。由此，我想到不仅仅是党校学员，包括各级领导干部在工作中要认真学习并要养成认真思考的习惯。”

日记是一种创造性的学习方式。一个坚持写日记的人，一定是个善于学习的人、善于思考的人，同时也是一个热爱生活并善于观察的有心人。几十年来，王宏波一直坚持写日记，从未间断，这是一种持之以恒的毅力。王宏波的日记不是枯燥的照本宣科，不是空洞无物讲大道理，不是陶犬瓦鸡的堆砌，更不是夏炉冬扇的做比成样。比如在《党校情怀》一节中，王宏波听完党校的一位老师解读，如何把《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运用到实践中，夜阑人静，王宏波在日记中写道：“我想领导干部一定要做到自律、慎独，不能狂妄自大，不能得意忘形。要谦虚谨慎。”这是肺腑之言，也是自我警示，更是身体力行的行为准则。

王宏波是党员干部，同时也是学者型的作家。几十年来，他手不释卷，业余时间搞文学创作，写日记。不久前他推出的两部散文集《雪夜，我们听诗去》和《高山莽莽》，深受读者的喜爱。读《党校日记》，我想起了爱国诗人陆游。有研究者说，陆游《入蜀记》六卷，或许是最早的日记体散文。《党校日记》与《入蜀记》有异曲同工之处，那就是作者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党校日记》是反映在文学中的政治，它不是枯燥的政治而是艺术的政治。文学中的政治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是一种炽热的情感奔流，是能对人心和社会发生巨大影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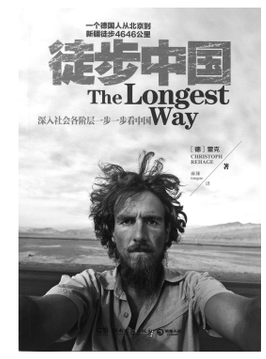
“党校，我们的学习结束了，但我们为党的事业奋斗的路途永无止境。”“阳光仍是光芒四射，未来是一片光明。”这是王宏波在《党校日记》最后一篇《记忆永恒》中说的两句话。《党校日记》起于《旭日东升》，止于《记忆永恒》，前后照应，浑然一体。《党校日记》具有政治性，也具有艺术性。缺乏艺术性的作品，无论政治上怎么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在文学创作上，政治和文学，无论哪一方都不能离开另一方单独存在，只有政治的高度和艺术的深度相结合，才是合理的，才会散发出作品的魅力。政治和文学有着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文学作品的价值力量，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作家的政治态度和政治激情。

所以我说，《党校日记》是党性与艺术性相互交融的心灵之作。

▼新书品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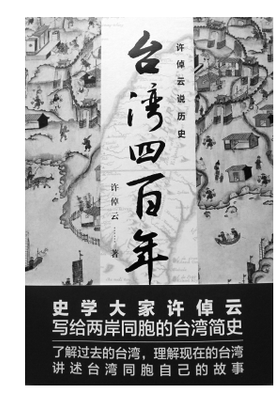
主持：李林荣

《徒步中国》，[德]雷克著，麻辣tongue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6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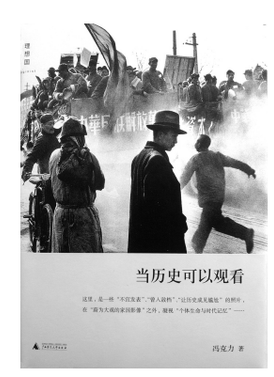
若用时下流行的文论术语来指称，这本《徒步中国》应该算是一部不折不扣的非虚构作品。全书共5章、320页，没有像某些“文不够、图来凑”的明星书那样，夹杂太多的照片，27万字的总篇幅里，近八九成都是结结实实的语言叙述。书中所述，是作者只身从北京徒步行走到乌鲁木齐的沿途见闻和个人经历。全程4646公里，历时11个月。除了交待这趟漫长旅程的结局和出发情形的两小节，被摆在开卷之处，整个行程中的其余各个片段，都顺时序依次排列，如线串珠，连为一脉。因而，展读之下，所得的感觉，也就恰如伴同作者，做了一趟艰苦并快乐着的逍遥游。不少长于写作的旅行家所特有的那种散淡到极致、也细腻到极致的畅达文笔，在这个译本里，仍有淋漓尽致的保留和体现。但这本书最可称道之处，还在于它展示出的那种与离群索居的极限探险明显相区别的、带有浓重世俗色彩和人间烟火气的旅行家风范：时时处处，都绝不耽于一味孤芳自赏的自我挑战，相反，总能以足够的耐心和兴趣，去从容体知途经各地种种场合的气息氛围和千差万别的风土人情。

《台湾四百年》，许倬云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6月出版



一部台湾史，满含民族泪。对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历史，我们之所以常要采用“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叙述方式，很大程度上，不在于两岸关系现状的特殊性，而在于台湾近400年来比祖国大陆遭受了更多、更深重的外来列强的侵扰和殖民这一客观史实。但要把台湾这段漫长曲折的历史全过程和其中的关键纠结，都通俗晓畅地说清道明，显然并非易事。出生于大陆、成长于台湾，从20多岁到80多岁，一半的时光都在台湾度过的美籍中国史专家许倬云，在他这本“说历史”系列的台湾史专题的分册里，以区区10万字，举重若轻，要言不烦，把一个本来难免会很沉重繁杂的话题，讲解得收放自如、条理分明。而尤为精彩的，是与史料陈述交相穿插的诸多凝聚了深切现实关怀的历史问题探析。比如，在第一章“被西洋海盗与东方倭寇拽进历史”中，点出了“台湾和大陆关系疏远的原因”；在第二章“从海盗集团到‘开台圣王’”里，强调了14世纪后东亚经济格局和白银贸易对海上走私的刺激；在第三章“清政府的‘汉化’大开发”中，详介了精耕农业入台和族群社会结构成型的细节；而在分别涉及日本殖民时期和国民党“威权”时期的第四、五章，除通常史著都会着力刻画的政治压迫状况之外，作者也用简省的笔墨特别观照到了当时台湾的社会经济建设。相形下，有关台湾当代史、特别是最近30多年历程的第六、七两章，在全书中显得最简略。但这也不错，因为面对现实的诤语良言，向来就是以诚为贵而非以多取胜。

《当历史可以观看》，冯克力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出版



印象中，我们的读图时代，是在整个传媒舆论界都憋足了劲、为跨进新世纪提前做热身运动的上世纪最后那三五年忽然降临的。一个后来看上去极富标志意味的事件，就是《老照片》的问世。到今年，《老照片》已经16岁了。值此之际，它的创刊主编冯克力先生，似乎在用这本名为《当历史可以观看》的新书，为《老照片》庆生。光看这本书的封面装帧，确实很有几分向《老照片》深深致敬的迹象。但展卷详读，才知道这不止是一本为《老照片》做总结的书，更是一本要从《老照片》的基础上努力再出发的、有深度和新追求的书。据作者后记中所述，书中多数篇章都取自他近一两年所写的杂志专栏“老照片札记”。文既如此，与之匹配的照片当然也是本色的“老照片”。较之这些“老照片”在《老照片》里的初次亮相，它们在这本书里的重装出场，最大的特色，是得到了更全面详尽的文字说明和更丰富开阔的意义阐发。这样，由此再现的老照片们，就不仅仅是可供近距凝视的一幅幅平面图像，更成为一个个能够启人遐思的立体场景。大概这也正是作者劳神钩沉、辛勤笔耕，持续不断地写出这些沉甸甸的有趣文字时，原有的一份初衷。或许，在这位读图时代的制造者看来，今天我们很多人虽然早已自认为读图成习，但实际上我们都还需要更进一步在读图方法上获得思想启蒙。

《思想利器：当代中国研究的史料问题》，谢泳著，新星出版社2013年4月出版

依书名和书中后记所称，这本书是作者近年当代中国史料研究方面的论文结集。书中收录论文12篇，其选题和体例都不太容易归于一类。但内容相对厚重的几篇，如《钱锺书史料九题》《伪史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的使用问题》《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中的史料拓展问题》《解读一份关于胡风事件的中央文件》《胡风事件的另类史料》《思想改造运动的起源及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还是围绕着作者素有所长的当代中国文坛学界内外情境的历史流变这一课题在做文章。而这个课题，也许是因为距离近、头绪杂、切身关联过于紧密，即使是在经历了好几轮思想解放的当前，也并不是随便哪位热心研究者都能应付妥帖。这里的核心纽结，正像作者通过上述这些具体的研究个案，所再三见证的那样，归根结底都集中于史料的搜求、考证、选择和运用环节。在为史料本身附加各种头头是道的阐释和演绎之前，或许来源和性质不同的多重史料的堆积、并举，已经在默不作声地呈现历史的本相。照这样看，在这本每每引录起材料来总能不厌其烦、长篇大论却又格外矜持的文集里，就仿佛随处都有材料本身在不是雄辩而胜似雄辩地说着话。